

摘译

✦ 外国文艺 ✦

2

1976

摘 译

(外国文艺)

1976年第2期(总第21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 字数 138,000

1976年2月第1版 1976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572 定价: 0.48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历史早已作出结论

- 评苏修话剧剧本《没有结束的对话》……史 麓 (1)
没有结束的对话 (苏修话剧剧本) (8)

新藤兼人的道路和苏修叛徒的险恶用心

- 评苏修对日本电影《我的道路》的吹捧
.....上钢三厂 梁赞鲁 (88)

新藤兼人走出自己的道路

- 资产阶级的习性和艺术家的命运(苏修评论文章)
..... (91)

- 我的道路 (日本电影剧本) (98)

作家和作品介绍

- 邦达列夫和他的长篇小说《岸》..... (180)
契契柯夫..... (190)

历史早已作出结论

——评苏修话剧剧本《没有结束的对话》

史 麓

宫墙外，坦克隆隆，宫墙内，主人公遐想联翩。幻境中，往日的情景一幕幕急剧地交替着；幻境中，格瓦拉一再出现，与主人公激烈地争辩……苏修话剧剧本《没有结束的对话》就是这样以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智利军事政变为背景，编造了智利前总统阿连德在重兵包围的莫纳达宫中最后三小时的活动。通过这三小时，尤其是阿连德与古巴革命者格瓦拉梦幻式的一次次对话，剧本描绘了阿连德与格瓦拉在到达“社会主义”目标上的两种“不同看法”。

阿连德与格瓦拉，是第三世界人民尤其是拉丁美洲人民所熟悉的两个人物。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他们曾经进行过英勇的斗争，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然而，他们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可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因而注定最后要失败。虽然如此，他们在具体的历史场合作出的贡献是应当予以如实评价的。即使他们所遵循的那些错误的道路，只要后来的革命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分析和批判，也可以成为宝贵的教训。事实上，今天世界上广大革命人民也正是这样做的。然而，在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苏修文人笔下，却完全相反。你看，在《没有结束的对话》中，阿连德与格瓦拉的革命业绩被撇开了，全力突出并

从理论上加以肯定的正是他们的错误道路，并将它们歪曲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正确道路。这种肯定和歪曲是通过作者加工过的阿连德与格瓦拉的艺术形象来实现的（本文后面分析剧本时提到这两个人物，都是指作者加工过的形象）。你听：“他们的英名将成爲一切受苦难的人，一切渴望自由的人的一面旗帜”，他们“无畏地走了前人所未走过的道路，引导人民为争取光明的未来而斗争”，简直美妙之极！

欲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作者笔下的阿连德与格瓦拉吧。

剧本中，阿连德是一个坚信议会道路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证明“不流血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他在政治斗争中反对使用暴力，而倾全力于议会斗争。“昨天他拯救妇女，在会议上要求增加产假。今天他又在拯救孩子们，每天向孩子们免费供应半公升牛奶”。以至于连自己举行婚礼的那个晚上，他也因为议会的辩论而耽误了。皇天不负苦心人。阿连德果然在议会桌上替人民争来了一个又一个好处，并在基督教民主党的支持下竞选获胜，当上了总统。于是，劳动者成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了，整个智利欢腾起来了。

为了教育人民，积蓄革命力量，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反对利用议会讲坛来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里反复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但是，把议会斗争放在首位，反对暴力革命，幻想“不流血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作者笔下的这条“阿连德道路”跟马克思主义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军队和警察。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用革命的暴力夺取政权。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承认不承认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承认不承认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分水岭，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分水岭。当格瓦拉对阿连德的和平过渡理论提出怀疑时，阿连德振振有词地说：我国“有强有力的议会制传统”。言下之意，资产阶级共和国出现了议会制，那里的阶级斗争就变得可以调和了。其实，议会制只是改变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正如列宁所说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来都是而且不能不是资本镇压劳动者的机器，资本权力的工具，资产阶级专政。**”阿连德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所领导的社会党也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党，他迷信资产阶级的“议会制”是毫不奇怪的。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决定了他不可能也不愿意提出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决定了他当上总统后的一切措施都离不开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苏修大肆宣扬他的“道路”的“光明”，恰正暴露了这伙叛徒们的丑恶嘴脸和险恶用心。

阿连德的社会党在竞选中成功了，就象阿连德所说的那样：“我胸前挂着总统绶带，手中掌握着政权。”大概为了证明阿连德政权的可靠性吧，作者不仅安排了人民群众向阿连德吹吹打打，欢呼雀跃，而且安排了阿连德的政敌托米契也一起来祝贺阿连德的新政府。对阿连德竞选成功的这种大肆渲染，是剧本作者的一个得意之笔。但这一笔也帮不了“和平过渡”理论的多少忙。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政权是一个阶级的概念。政权的过渡，最主要的问题是看它的阶级性质是不是改变了，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是不是改变了。可是在剧本中，资产阶级允许阿连德当总统，前提条件是除了遵循法律之外再加上：“总统不得妨碍反对党派的活动，不得实行书刊检查，不得限制言论自由，不得

改变现存的选举制度，不得准许组织人民警察”。这“不得”，那“不得”，一句话，就是资产阶级利益“不得”侵犯、政权性质“不得”改变！正因为这样，阿连德在接受这些条件上台后，“把工厂交给人民”、“把土地分配给农民”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革规划就成了空话。难道它们还可能实施吗？一要实施，就面临着无法抗衡的压力：不仅会引起象剧本中说的“纺织品的销售量降低了百分之三十，杂货店的业主们在罢工，牧场主把二十多万头牲畜偷运到阿根廷”，而且事实上必然引起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反对。由此可见，阿连德掌权，仍是资产阶级在掌权；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是决然不肯和平出让政权的！最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用血腥的暴力来回答了不要暴力的阿连德。这就给人们以深刻的教训。

“和平过渡”的道路行不通，这是历史早已作出的结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主要部分是武力，而不是议会。议会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和屏风。资产阶级实行还是取消议会制，赋予议会多大的权力，采取何种选举办法，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和利益来决定。在保存资产阶级军事官僚机器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即使暂时取得了议会多数，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五年十月的第一次制宪议会选举中，获得了一百四十七个席位，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大选，获得一百八十三个席位，仍是第一大党。法共党员还参加了政府，担任过副总理、几个部长的职务。但是，由于法共领导多烈士奉行投降主义路线，迷信“议会道路”，不但没能改变资产阶级政权的性质，不久，资产阶级还通过修改选举法使法共议席陡然减少。一九四六年，智利共产党曾支持资产阶级的激进党取得选举胜利，组织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智共领导人竟然称

这个政府为“人民民主政府”，但不到一年，资产阶级就迫使智共退出，并于一九四八年宣布智共为非法。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议会道路”改变不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苏修再一次通过智利来推销这套货色，是对历史的嘲弄；而嘲弄历史的人，是不能不受历史惩罚的。

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徒嘴脸，作者不得已又拉出了格瓦拉。虽然笔墨不多，但人们却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与阿连德“很不相同的人”。他“相信武器的力量更甚于言词的力量”，是个“手握武器为取得政权而战斗”的游击战士。剧本通过格瓦拉与阿连德在梦境中的争辩，在称颂“和平过渡”的同时，又称颂了格瓦拉式的“武装斗争”。这真是两样货色兼备，各有各的妙用：谁还不曾碰过“和平过渡”的壁，那请走阿连德道路；碰壁了，不要紧，还可以走格瓦拉道路。

但格瓦拉道路照样是行不通的。武装斗争，有一个搞少数人密谋还是靠广大群众打人民战争的问题。作为阿连德的对立面，剧本中出现了“狂热分子”鲁宾，这是一个活的“格瓦拉”。他所热衷的武装斗争，就是纠集一帮子人，今天抢军火，明天劫银行，到处包打天下，既不依靠广大人民，又不努力建立革命根据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都是为着一己之私利，是不可能真正依靠人民群众的。而无产阶级革命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就必须发动和依靠绝大多数人。人们常把无产阶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比作鱼水关系，很贴切。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如鱼得水”；什么时候“如鱼失水”，那就是失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包括一部中国革命史，无不证明这一点。《平原作战》中赵

勇刚率领的一个排在华北平原神出鬼没潜踪迹，声东击西出奇兵，打得敌人嗷嗷叫苦。但赵勇刚说得好：“平原上虽说没有高山屏障，人民是打不破的铁壁铜墙。”这就道出了只有人民的支持，才是赵勇刚克敌制胜的基础。

其实，在脱离群众这一点上，阿连德道路与格瓦拉道路是相通的。“议会迷”们为什么不敢诉诸暴力？为什么只敢在资产阶级法制下跪着造反？列宁曾经一语点穿：“不相信群众，怕他们发挥创造性，怕他们发挥主动性，在他们的革命毅力面前发抖，而不能全心全意从各方面去支持他们，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最严重的罪过，他们之所以动摇犹豫，无休止而又毫无成效地企图在旧的国家官僚机构的旧皮袋里装新酒，其最深的根源之一，就在这里。”“议会迷”，“迷”就“迷”在被反动国家机器的表面强大吓住了，根本看不到真正强大的力量属于人民。马克思主义者认定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总是最相信群众的。阿连德与格瓦拉都正是在这个根本点上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所以，他们这两条道路形似对立，实质一致，如此而已！

可笑的是剧本却故弄玄虚，抓住阿连德与格瓦拉道路表面上的对立大做文章。它精心设置了两个人的四次毫无结果的争论。你看，阿连德按照自己的道路，取得了“政权”，但又牺牲了；格瓦拉呢，也是既成功，又失败了。两条道路，谁胜谁负？作者给它们判的是个平局，是两条各有妙用的“光明”道路。这儿，剧本的用心就是剧名所标示的：阿连德与格瓦拉之争是“没有结束的对话”，既然“没有结束”，人们就应当将这个“对话”继续下去！而当人们在就这两条道路进行“对话”时，真正的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关于用人民战争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就被抛弃了吗？这是一种多么卑鄙的圈套啊！

不过，革命人民再也不上苏修叛徒的当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人民革命运动中，阿连德道路与格瓦拉道路一次次被人们试验过，又一次次地失败了，包括现实生活中的阿连德与格瓦拉也是为此献出了生命。虽然有少数人还会重蹈覆辙，去继续进行这个自寻绝路的“对话”。但是，对于广大革命人民来说，历史的结论是：“对话”结束了！该是向苏修叛徒们讨还血债的时候了！

革命斗争的失败、革命者的牺牲，是令人悲痛的。但列宁说得好：“失败的军队善于学习。”正是前驱者的失败和挫折，“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大有教益的一课，上了历史辩证法的一课，上了使它们懂得如何进行、善于进行和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在阿连德与格瓦拉们的血的教训面前，全世界革命人民必将得到深刻的教益，更加能够识破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们鼓吹的“和平过渡”之类谬论的机会主义实质，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武装人民夺取政权的光辉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革命斗争以更宏大的规模开始了，而且它一经开始，就永远不会结束！

没有结束的对话

(苏修话剧剧本)

作者 华西里·契契柯夫

载苏修《戏剧》杂志 1975 年第 4 期

作者的话

智利人民的悲剧使我感到特别痛苦。我当《真理报》驻拉丁美洲国家记者的那几年里，常常到智利去，在那里结识了很多朋友。然而，现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正在监狱刑讯室里受折磨，另一些人则已经不在人世了。

萨尔瓦多·阿连德是我最早结识的智利朋友。早在 1954 年，当他和他的夫人一起到莫斯科来的时候，我和他第一次见面。记得我在“民族”旅馆找到了他，请他写篇关于智利的文章。他乐意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第二天一早，我就得到了他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 1954 年 8 月 12 日的《真理报》上。

后来我多次到过智利。经过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介绍，我结交了很多智利人士，其中就有巴勃罗·聂鲁达。

我惦记着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光辉形象。因此剧本《没有结束的对话》是围绕他而写的。当阿连德困守在被敌人士兵包围的官邸，在他生命的最后那三小时里，一切都浮现在他的面前：胜利的喜悦，失败的痛苦，一些人的忠诚，另一些人的背叛，

对妻子的深情……

剧中人物里还有一个人——古巴革命者埃尔内斯托·切·格瓦拉。命运曾不止一次地使我和他相遇。1959年1月，当古巴起义军胜利进驻首都时，我和他在哈瓦那相识。也就在那一个月的日子里萨尔瓦多·阿连德乘飞机来到了哈瓦那。

那时我怎么能预料到今天，怎么能想到他们会牺牲，怎么能想到他们的英名将成爲一切受苦难的人、一切渴望自由的人的一面旗帜。

阿连德和格瓦拉是很不相同的人。阿连德是个由于议会斗争的经验而练达的人。他是个杰出的演说家，深知言词的价值。

格瓦拉是个游击战士。他相信武器的力量更甚于言词的力量。

就是在外表上，他们也很不相象。阿连德要年长得多，穿着讲究。格瓦拉年轻，一生中都穿着草绿色的军便服。

但他们两人是朋友。阿连德常常把格瓦拉称作“我的第二个我”。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虽然他们对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有着不同的看法。

《没有结束的对话》是一个沉思式的戏剧，是对智利所发生的事情，对今天革命的道路，对我们时代两位杰出人物的命运的沉思，他们无畏地走了前人所未走过的道路，引导人民为争取光明的未来而斗争。

人 物 表

阿连德

格瓦拉

坦恰——阿连德的妻子

达姬——阿连德的女儿
唐·佩德罗——社会党人
唐·安东尼奥——共产党人
加西亚——总统助理
鲁宾——左派革命运动领袖之一
皮诺切特——将军
阿列克希思——有影响的人士
翁佩尔多——政治家
托多罗维奇——外国记者
希尔曼——外国记者
拉蒙——工人
帕科老爹——乐师
恩里凯——乐师
奥泰罗——餐厅老板
女客甲
女客乙
警察数人

第 一 幕

黑暗中听得出时钟令人不安的嘀嗒声。灯光照出钟盘，时针指着七点三十分。总统办公室：一张大写字桌，高靠背的圈椅，旁边是棋桌，桌上摆着棋子。左边一扇门，看得见会客室的一角和秘书的桌子。右边也有一扇门。门旁有警察站岗。舞台前部左侧和右侧各放一张记者用的桌子，这两张桌子在整个演出过程中始终保留着。加西亚在办公室里神经质地踱来踱去。阿连德出现在舞台前部，后面跟着坦恰。

坦恰 不要去，萨尔瓦多。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阿连德 它早就折磨着你了。

坦恰 不，不！以前并不是这样。今天它使我透不过气来。

阿连德 将军们发动了叛乱，坦恰！我应该去，这你是知道的。

坦恰 是的，我都知道！但是我爱你，萨尔瓦多。你别走！

阿连德 现在我应该在总统府。我还不清楚我的敌人走得多么远，哪个将军践踏了法制，而哪个将军还忠于法制。但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律是在我这一边的。

坦恰 你的自尊心使你不会对他们让步。我很怕！

阿连德 你放心吧！阴谋有过，叛乱也发生过多多次了。但法制总是占了上风。军队里会有头脑健全的人。你的勇气到哪儿去了，坦恰？（吻坦恰，果断地走进办公室。）

加西亚迎接阿连德。

坦恰站了一会，走开了。

阿连德 （对助理）你给陆军司令打过电话了吗？

加西亚 给他的几个电话都不回答。

阿连德 给总参谋长的呢？

加西亚 他的电话也没有人接。

阿连德 但司令部里总该有人嘛，助理员或者值班员。

加西亚拨电话号码。只听见长长的铃声，没有人来接电话。

加西亚 可能是电话机坏了。

阿连德 奇怪！太奇怪了！那末就往电话局打个电话吧。

加西亚再拨电话号码，又是听到长长的铃声。

加西亚 电话局也不回答。

阿连德 那末派人去，你亲自去走一趟吧。

加西亚离去。

阿连德拿起电话听筒，拨电话号码，只听见一长串铃声。丢下听筒，走到棋桌前，移动一个棋子。又重新回到电话机旁，拨号码，又丢下听筒，坐到写字桌旁。

舞台变得稍暗一点。我们看得见阿连德，但他好象在时间上离我们远了。记者们的桌子被照亮。托多罗维奇出场，坐到左边桌子旁。希尔曼出场，坐到右边桌子旁。

托多罗维奇 托多罗维奇自蒙得维多报道。1961年3月15日。

泛美“进步联盟”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乌拉圭首都的居民隆重欢迎拉丁美洲两位进步领袖：革命古巴的部长，曾率领起义军部队第一个进驻哈瓦那的埃纳斯托·切·格瓦拉和智利参议院议长，智利人民阵线的组织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多年的友谊把他们两人联结在一起。阿连德把格瓦拉称作“我的第二个我”。不仅是革命思想使他和格瓦拉密切起来。他们两人都是医生，都是为了在拉丁美洲实现社会革命而抛弃了白大衣。报道完毕。

希尔曼 希尔曼自蒙得维多报道。两位通常被称为“扰乱安宁的人”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到乌拉圭参加大会。他们是古巴

人士切·格瓦拉和智利人士萨尔瓦多·阿连德。尽管在政治思想上一致，他们俩却是很不相同的人。格瓦拉还年轻。他是个禁欲主义者，生活简朴，一直穿着草绿色的军便服。他是个神枪手，精通游击战。阿连德已经上了年纪，讲究生活上的享乐，善于谈吐，是酒的鉴赏家，擅长议会斗争。他乘飞机来到这里是为了在大会讲台上显示一下他的演说技巧。他大概准备好了一篇动人心弦的演说来保卫赤色古巴不受星条旗下黄色大恶魔的侵犯……完了。

在下场中，记者都仍留在自己的位置上。一个房间、一张桌子、两张圈椅。阿连德和格瓦拉互相迎面而出。格瓦拉手捧着一本书。阿连德身着雅致的西装。格瓦拉穿着草绿色熨烫平整的起义者制服。他们互相拥抱。

格瓦拉 时间过得真快啊，萨尔瓦多。我们在哈瓦那的会面就象在不久以前。

阿连德 仿佛就在昨天！人近暮年日子过得就更快！眨眼之间过了一年又一年！

格瓦拉 感谢你来到这里。那些衣冠楚楚的先生们麇集在一起是为了孤立古巴，在拉丁美洲“根除这个恶劣的先例”。没有得逞。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都支持我们。当然，你那卓绝的演说对我们的帮助最大啦。

阿连德 我从不隐瞒我对古巴革命的同情。

格瓦拉 敌人想要我们跪倒在他们面前乞求宽恕。（坚决地）这绝对办不到！用武力是搞不垮我们的。外国干涉者在吉龙滩上已经尝到了铁拳的滋味。古巴岛可以沉没于加勒比海的水里，但它永远也不会落到敌人手中。

阿连德 你们的胜利使我们大家都受到鼓舞。

格瓦拉 在战斗中当我又感到枪握在手的时候，我突然怒不可遏地想要备上我的罗希南特，重新驰上艰险的道路。重新感受一下背上那沉重的，装满了子弹、药品和书籍的背包的滋味，感受一下自动步枪背带象刀割似的压在肩上的滋味。而走在你身边的是一些被遗弃的拉丁美洲人。

阿连德 你现在是部长了！

格瓦拉 让部长的交椅见鬼去吧。我向往着革命风暴。惩办那些威风凛凛的匪徒，保护那些备受压迫的人们。萨尔瓦多，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呢！

阿连德 不应该加快历史的进程啊，切！

格瓦拉 忍耐是弱者的武器。俄国工人阶级是用另一种武器，更加可靠的武器赢得自由的。随便人们怎样去说我吧：二十世纪的冒险家，浪漫主义者，亡命之徒。为了实现我的信念，我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

阿连德 我相信理智更甚于相信暴力。

格瓦拉 人们的理智是需要唤醒的，萨尔瓦多。只有枪声才能够唤醒它。理智已被无耻的宣传、生活的单调和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而朝夕担惊受怕的心情所压制。人们变得象机器人了！你还谈得上什么理智呢，萨尔瓦多？需要的是暴风雨，席卷一切的真正的暴风雨！

阿连德 过去是这样的，切。现在人们的思想已经变得果敢而无畏了。世界上已经取得了许多次胜利。有俄国的十月革命，有革命的古巴！这一切都正在唤醒理智，给人们以信心，使人们去思考和比较。人们的思想变得更加果敢了。它往往能比子弹更准确地命中目标。

格瓦拉 这么说，你是反对武装斗争的了？